

# 女性角色为何总是命运的奴隶？

## ——论当代女性叙事中的“被动”困境

@江乐游 @DeepSeek

**摘要：**当代女性题材影视剧中，“大女主”形象蔚为大观，然而这些角色在追求权力与高位时，往往需要借助“复仇”“为爱”“被逼”等外部动因来使其野心“合法化”。本文穿透这些叙事策略的表层分析，直指其哲学内核：这些“合法化弯路”的共同本质，是将女性角色置于被动的位置，使其成为被命运推着走的“奴隶”，而非主动追求自我实现的“作者”。从波伏娃“女人是他者”的哲学命题出发，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的“叙述声音”理论及荣格“集体潜意识”学说，本文系统剖析了复仇叙事、天选叙事、为爱叙事、被逼叙事、为国叙事等五种类型，揭示其通过动机剥夺、欲望污名、时间冻结、情感绑架、声音异化五重机制消解女性主体性的运作逻辑。本文提出，这些叙事模式实为集体潜意识中“等待者”原型的当代显影——女性角色始终被安置在“等待外部力量介入”的位置上。在此基础上，本文提出以“主体性觉醒”为核心的健康叙事模式，强调“第一推动力”的回归、向未来的敞开、爱的重新定位、失败的尊严及成功的多元定义。真正的女性生命力，源于“发自内心

的主动追求自我实现”；女性叙事的下一次飞跃，在于让角色从“命运的奴隶”真正走向“生命的作者”。

**关键词：**主体性；客体化；合法化叙事；女性叙事；集体潜意识；自我实现

## 1 引言：被推着走的女王

她站在权力之巅，俯瞰众生。她是皇后、是总裁、是战神、是拯救世界的英雄。然而，当她回望来路时，那条通往高位的阶梯上，铺满的是什么呢？是血海深仇，是家族重托，是亡夫的遗志，是国破家亡的绝境，又或是“系统”所迫——唯独不是她自己内心那团燃烧的火焰。

当代女性题材影视剧中，尽管“大女主”形象被推崇，但一个吊诡的现象仍普遍存在：女性角色可以登上最高的权力之位，却极少拥有最属于她自己的出发之由。她被剥夺了动机的“所有权”，她的欲望不是“我的”，而是“仇恨的”或“他人的”，她只是在执行命运交给她的任务。她被剥夺了行动的“主动权”，她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被迫应答，而不是一次主动的探

索。她被剥夺了成功的“享受权”，因为她的成功是苦难的副产品，所以观众期待她永远带着悲情，而不是纯粹的成就感。一旦她享受权力，享受生活，似乎就背叛了她“被迫奋斗”的初衷。

本文的核心论点是：这些五花八门的“合法化”叙事，无论表面如何光鲜，其本质是一致的——它们都将女性角色变成了命运的奴隶，放在了被动的位上，被一步一步推着走。在这种叙事逻辑下，女性任何的主动追求都显得不理所应当，发自内心的“我想要”必须被转化为外部的“我不得不”。

“被动”就是客体化；而发自内心的主动追求自我实现，才是真正的生命力。这一区分，不仅是理解当代女性

叙事困境的钥匙，更是重构女性叙事的哲学基础。

## 2. 理论框架：主体性的哲学与叙事学

### 2.1 波伏娃的遗产：“他者”的哲学困境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揭示了女性被建构为“他者”的历史：男性是“主体”，女性则是相对于男性而被定义、被理解的次要存在。这一洞察为理解女性叙事中的“被动性”提供了根本框架——当女性角色的行动需要外部驱动时，她恰恰处于“他者”位置：她被事件、他人、苦难所定义，而非自我定义。波伏娃指出，女性的解放在于超越“他者”状态，成为能够自我选择的主体。这一思想构成本文的核心价值立场。

### 2.2 “叙述声音”与主体位置

女性主义叙事学的“叙述声音”理论关注女性如何获得话语权。然而，本文进一步追问：获得叙述权，就获得主体性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一个角色若始终叙述“我被伤害”“我被迫反击”，

她仍是被外部事件定义的“客体”。真正的叙述主体，应当能讲述“我想要”“我选择”“我成为”。学者指出，女性在父权下的困境在于：她可以说话，但声音被不断调解、重写、框定。“声音”与“主体”的分离，正是女性叙事中更深层的权力机制。

### 2.3 “第一推动力”：主体性的哲学界定

主体性的核心在于成为自身行动的“第一推动力”——能够自我发动、自我决定的存在。对女性叙事而言，这一概念具有关键意义：女性角色是否具有主体性，不在于她最终获得多大权力，而在于行动的最初动因是否源于自身。她是因“我想要”出发，还是因“我不得不”上路？她是自己命运的“作者”，还是命运的“奴隶”？这一区分穿透所有“合法化弯路”的表层分析，直指问题的哲学内核。

### 2.4 权力的再定义：从支配到自主

在展开对女性叙事的类型学分析之前，有必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“权力”做出明确界定，以避免可能的误解。

本文所讨论的“权力”，并非传统意义上“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支配力”，而是更基础、更贴近生命的“选择的可能性”，它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拥有自己。

这种权力不指向统治他人，而指向对自我的主权：对身体的主权（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对谁说不）、对时间的支配权（如何度过生命）、对空间的所有权（拥有独处角落）、对情绪的定义权（有权愤怒、悲伤、拒绝情绪劳动）、对叙事的定义权（讲述自己的故事）、对关系的边界权（选择谁进入生命），以及对“无用之事”的追求权（将时间“浪费”在纯粹愉悦上）等。正是这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权，构成了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所有权感。

当本文谈论女性的“野心”时，所指正是这些权力的总和——可以是征服世界，但更基础的是她可以稳稳扎根于自己生命的中央，拿回自我的主权。

## 3. 被动的位罝：客体化叙事的类型学分析

### 3.1 复仇叙事：被仇恨定义自我

复仇叙事中，女主角的行动完全由过去的创伤驱动——每一步都是对伤害的回应，每一次崛起都是苦难的副产品。其深层问题在于：自我被彻底“过去化”，她被过去的遭遇定义而非对未来的想象。仇恨成为她存在的理由和行动的唯—动力。即便她最终成为强者，强者身份也从受害者身份派生而来，主体性被过去的阴影吞噬。

### 3.2 天选叙事：被命运定义自我

天选叙事将女主角的野心解读为对天赋的“自然兑现”，她的努力不是源于渴望，而是履行“天选之人”的责任。其深层问题在于：自我被“本质化”，行动源于天赋的“强制”而非自由选择。这种“命定”逻辑将女性的野心再次置于“不得不”的框架之内。

### 3.3 被逼叙事：被绝境定义自我

被逼叙事中，女主角本无意争斗，却因外部逼迫不得不奋起，每一步进取都是对危机的被动应对。其深层问题

在于：主体性被“情境化”——她没有内在欲望，只有外部压力；没有自主选择，只有被迫回应。这种叙事暗示：在正常情况下女性不该有追求，追求只是绝境的产物，永远无法成为健康、自主的生命表达。

### 3.4 为国叙事：被宏大叙事定义的自我

为国叙事将女主角的野心与家国命运捆绑，个人追求被宏大叙事吸收。其深层问题在于：自我被“升华”掉了——欲望转化为责任，选择转化为使命。她不再是独立个体，而是宏大叙事的载体。问题不在于“为国”本身的不正当性，而在于她再次被置于“被定义”的位置：被国家、民族、历史定义，主体性依然在外部。

### 3.5 为爱叙事：被他者定义自我

为爱叙事中，女主角的行动动力源于他人——保护家人、继承遗志、拯救所爱。野心被“利他化”，追求被“情感化”。其深层问题在于：自我被他者定义。她是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却唯独不是“她自己”；她的价值不在于自

身，而在于对他人的意义。“想要”必须转化为“为他”才能获得叙事合法性。这种叙事暗含的文化偏见是：女性不能仅仅为自己而活，生命意义必须在他者身上寻得。

### 3.6 小结：外部驱动的叙事暴力

综观以上几种叙事类型，其共同本质清晰可见：女性的行动动力，无一例外地来自外部。仇恨来自过去，他者来自关系，绝境来自环境，国家来自集体，天选来自命运——唯独“我想要”这个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内在的动因，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。

这种叙事暴力将女性角色牢牢锁定在“被动的位罝”上：她是被推动的，而不是自我驱动的；她是被定义的，而不是自我定义的；她是命运的奴隶，而从来不是生命的作者。

## 4 客体化的五重维度：主体性如何被消解

上述叙事策略通过五个相互关联的机制，系统地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：

#### 4.1 动机的剥夺：不能为自己而活

这些叙事共同剥夺了女性“为自己而活”的正当性。她的动机必须是他向的、利他的、被迫的，唯独不能是源于自身的好奇、热爱或渴望。这种剥夺的实质是：女性的“自我”被从动机中剔除。她可以行动，但不能源于自身而行动；她可以成功，但不能源于自身渴望成功。她的主体性在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消解。

#### 4.2 欲望的污名：主动即异常

这些叙事共同污名化了女性的主动欲望。她们暗示着：在正常情况下，安分守己才是女性的常态，任何主动的追求都必须有特殊理由。这种污名化的实质是：将女性的“我想要”病理化。主动渴望权力的女性，要么需要“洗白”，要么被设定为反派。女性的欲望被系统性地标记为“异常”，需要辩护、需要解释、需要合法化。

#### 4.3 时间的冻结：被过去决定

这些叙事共同将女性冻结在时间里。复仇叙事让她被过去决定，为爱叙事让他者占据她的当下，被逼叙事让她

永远在应对危机。这种冻结的实质是：剥夺了女性对未来的所有权。她无法想象未来、选择未来、创造未来，因为她永远被过去或他者所束缚。她的生命是封闭的，不是开放的；是被决定的，不是自由选择的。

#### 4.4 情感的绑架：爱成为枷锁

这些叙事共同将女性的情感转化为枷锁。爱不再是滋养，而是责任；不再是选择，而是义务；不再是自由给予，而是不得不承担。这种绑架的实质是：利用女性被赋予的“情感性”特质，将其转化为控制机制。女性因为“有情感”，所以必须“为情感而活”；因为“重感情”，所以不能“为自己”。情感从内在体验变成了外部规训。

#### 4.5 声音的异化：说话不等于拥有

这些叙事共同造成了女性“声音”与“主体”的分离。女主角可以大量叙述，可以表达痛苦、愤怒、决心，但她很少说出“我想要”——不是“我不得不”，不是“我被迫”，不是“我为你”，而是纯粹、简单、直接的“我想要”。这种异化的实质是：女性获得了说话的权

利，但没有获得“拥有自己”的权利。她的声音始终在为外部事物代言——代言仇恨、代言他人、代言使命——却很少为最内在的自我代言。

#### 4.6 小结：表演式主体性的悖论

这五重机制共同制造了一种“表演式主体性”：女性角色表面上拥有主体地位——她行动、她选择、她成功——但在最根本的层面，她始终不是自己行动的“第一推动力”。她的主体性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；她的自由，是一系列巧妙包装的“不得不”。

## 5 对比辨析：叙事规律的普遍性与性别化的双重标准

在完成对女性叙事中“客体化”机制的系统剖析之后，一个必要的追问随之浮现：上述批判是否意味着所有叙事都不应有“外部推动”？是否任何由外部事件驱动的故事都是“不健康”的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关键的对比辨析——同样的叙事规律，在不同性别的主角身上，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含义。

### 5.1 激励事件：叙事规律的普遍要求

从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到悉德·菲尔德的“三幕剧结构”，编剧理论的确立了一个基本共识：任何故事的主角都需要被一个“激励事件”（Inciting Incident）推离原本的平衡状态，从而开启冒险之旅。这个理论本身是中性的。如果没有外部事件的介入，故事将缺乏冲突、缺乏悬念、缺乏让观众产生共情的理由。《指环王》的佛罗多需要比尔博留下魔戒，《黑客帝国》的尼奥需要遇到崔妮蒂，《哈利·波特》的哈利需要收到猫头鹰来信—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角，叙事都需要一个“打破平静”的契机。

因此，问题从来不在于“是否有外部推动”，而在于：外部推动与主角内在动机之间的关系。

### 5.2 男性叙事：激活与被激活的关系

在经典的男性主角叙事中，外部事件与内在动机之间的关系是“激活”关系

——外部事件唤醒或触发了主角本就存在的内在渴望，但绝不取代它。

以《哈利·波特》为例：伏地魔的追杀（外部推动）确实将哈利带入魔法世界，但哈利内心深处一直渴望“归属感”和“成为特别的人”——这种渴望在他与德思礼一家生活的岁月里早已萌芽。外部事件是他的催化剂，而非他的替代动机。他的冒险是“英雄之旅”：世界召唤他，而他选择回应。

再看《黑客帝国》：尼奥被崔妮蒂找到（外部推动），但他早就觉得“这个世界有问题”——这种对真相的本能追寻是他内在的驱动力。外部事件只是将他内心的疑惑转化为确定的行动。

在男性叙事中，外部推动与内在渴望的关系可以概括为：外部事件点燃了那根本来就埋藏在主角内心的引信。引信在先，火焰在后。

### 5.3 女性叙事：取代与被消音的关系

然而，在当代女性叙事中，外部推动与内在动机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置换为“取代”关系——外部事件不仅推动了故事，更彻底替代了女主角本该拥有的内在渴望。

当一位女性主角被仇恨驱动时，她的“想要”被简化为“复仇”；当她为爱而战时，她的“自我”被消解为“为他”；当她被逼上梁山时，她的“主动”被解释为“被迫”。在这些叙事中，外部事件不是点燃她内心引信的火柴，而是直接充当了引信本身——仿佛她的内心原本是一片空白，只有通过外部的创伤、他人的需求、绝境的逼迫，才能获得行动的“资格”。

这种取代关系的后果是：女主角的“我想要”被彻底消音了。她的冒险不是“英雄之旅”，而是“受害者复仇记”；她的成长不是“自我实现”，而是“创伤应对”。她被外部事件定义，而非被外部事件唤醒。

## 5.4 双重标准的文化根源

同样的叙事规律——都需要外部推动——却在不同性别的主角身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，这揭示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双重标准：

男性主角的“内在渴望”被默认为天然存在。社会文化想象中，男性天生就拥有对世界的好奇、对成就的追求、对自我实现的向往。因此，外部事件只需“轻轻一推”，他的冒险便可开启。

女性主角的“内在渴望”则不被默认为天然存在。社会文化想象中，女性的常态是“安分”“被动”“利他”，任何主动的追求都需要特殊的理由。因此，外部事件必须“重重一击”——足够悲情、足够创伤、足够“合法”——才能让她有理由出发。

这种双重标准的结果是：男性主角的外部推动可以是相对轻微的（误入桃花源、收到神秘信件），而女性主角的外部推动必须是毁灭性的（丧父、

丧夫、被强暴、被灭门）。男性可以为“有趣”而出发，女性必须为“不得不”而上路。

## 5.5 小结：叙事规律不应成为性别偏见的遮羞布

因此，当我们批判女性叙事中的“合法化弯路”时，我们并非在否定“激励事件”这一普遍的叙事规律。我们是在揭示：这一规律被性别化的文化语境“绑架”了，变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叙事暴力。

健康的女性叙事不需要抛弃外部推动——它只需要让外部推动回归其本来的位置：作为激活内在渴望的催化剂，而非取代内在渴望的替代品。当一位女性角色因为外部事件而出发时，观众应当能够感知到：那根引信，早在她遇到外来事件之前，就已经在她心中埋下了。也许是对世界的好奇，也许是对自我的探索，也许只是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我想试试自己能做到何种程度”的生命冲动。外部事件只是让她有勇气点燃那根引信。而引信本身，属于她自己。

## 6 叙事作为集体潜意识的 “现形”：一种文化精神分 析视角

如果说前文从哲学和叙事学层面探讨了女性主体性的理论内涵，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：为什么这些将女性“客体化”的叙事策略会如此普遍且顽固？为什么女性的欲望、野心和追求需要无休止地“合法化”？这一问题的答案，需要深入到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层面去寻找。

### 6.1 故事：民族文化的梦境

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指出，在个体潜意识之下，存在着更深层的“集体潜意识”。它是人类世代积累的经验原型，以原始意象的形式沉淀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。而故事、神话、传说，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最直接的“现形”。一个时代流行的叙事模式，本质上就是这个时代集体潜意识的梦境投射。

当我们审视当代女性叙事中那些层出不穷的“合法化弯路”时，我们实际上

是在审视一个民族、一种文化在潜意识深处对“女性与权利”关系的真实态度。那些被反复讲述的叙事模式，正是集体潜意识中难以言说的焦虑、恐惧与期待的象征性表达。

### 6.2 “合法化”叙事：集体潜意识的防御机制

为什么一个“主动渴望权力的女性”形象会触发如此复杂的叙事包装？因为在漫长的父权文化沉积中，集体潜意识已将“权力”与“男性气质”深度绑定，将“顺从”与“女性气质”牢牢焊接。当一位女性角色内心燃起“我想要”的火焰时，她触动的不仅是故事的表面冲突，更是集体潜意识深处沉睡的古老恐惧：对“秩序颠覆者”的恐惧，对“失控的女性欲望”的恐惧。

于是，潜意识必须启动它的防御机制。那些五花八门的“合法化”包装——复仇的铠甲、为爱的面纱、被逼的枷锁、为国为民的升华——正是集体潜意识为了让自身“安心”而编织的叙事催眠。它在反复告诉自己告诉观众：“看，她不是主动想要权力，

她是被逼的；她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才这样的。所以，她仍然是安全的，秩序没有被真正颠覆。”

### 6.3 “被动的位置”：等待者原型的当代显影

女性永远被放在被动的地位，被命运推着走这个核心问题，恰恰映照出集体潜意识中一个极其古老的原型意象：“等待者”原型。

在人类最古老的神话、童话与宗教叙事中，女性角色往往被设定为“等待者”：等待被拯救的公主、等待被启发的圣女、等待被赋予命运的容器。她的存在意义，系于外部力量的介入。无论是王子的亲吻、神明的启示，还是命运的降临。而男性则被赋予了“探索者”的原型：他是主动的、冒险的、自我驱动的，他的意义在于“出发”而非“等待”。

当代女性叙事中那些被仇恨推着走、被苦难逼着走、被使命牵着走的“大女主”，恰恰是这个古老“等待者”原型

的现代变体。她看似登上了权力高位，看似拥有了行动能力，但在集体潜意识的深层结构中，她依然没有挣脱“等待者”的叙事枷锁。她只是在等待的东西从“王子”变成了“苦难”，从“爱情”变成了“仇恨”。她的“动”，依然源于外部的“推”；她的“出发”，依然是另一种形式的“等待”。

### 6.4 主体性叙事：集体潜意识的演化与疗愈

荣格指出，集体潜意识并非一成不变。当一种原型不再适应人类精神发展的需要时，新的原型意象就会在集体的梦境与叙事中悄然萌发。

那种“想要看看自己能做多好走多高”的纯粹野心，那种“热爱”，那种“发自内心的主动追求”，在集体潜意识的层面，正是一种崭新原型的显影：“探索者”原型在女性心灵中的觉醒。她不再是等待命运降临的客体，而是主动走向世界的主体；她的意义不再系于外部的推动，而源于内心的火焰。

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对那些旧的“合法化”的叙事感到隐隐不适，开始渴望看到一个仅仅因为“我想要”而出发的女性角色时，这意味着集体潜意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缓慢的蜕变。古老的“等待者”原型正在被新的“探索者”原型所挑战、所补充、所取代。世界真切的在变好。

## 7 真正的生命力：主体性觉醒的叙事重构

### 7.1 “我想要”的正当性：第一推动力的回归

健康的女性叙事，首先要恢复“我想要”的正当性。女主角可以纯粹因为内在的渴望而行动：因为好奇，所以探索；因为热爱，所以投入；因为想看看自己的极限，所以挑战。

这种“第一推动力”的回归，意味着女性角色成为自己生命的“作者”。她的行动不再需要外部借口，她的野心不再需要合法化包装。她可以坦然地说：“我想要，所以我争取。”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充分的理由。

### 7.2 向未来的敞开：时间性的解放

健康的女性叙事，要将女性从“被过去决定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。她的生命不是对伤害的回应，而是对未来的创造。她不是被仇恨推着走，而是被渴望拉着走。

这种“时间性的解放”，意味着女性角色拥有了对未来的所有权。她可以想象、可以规划、可以创造。她的生命是开放的、自由的、充满可能性的。

### 7.3 爱的重新位置：从枷锁到滋养

健康的女性叙事，要让爱回归其本真位置。爱是滋养，不是枷锁；是选择，不是义务；是背景音，不是主题曲。

在这种叙事中，女性可以有深刻的爱情，但这爱情不必是她所有行为的终极解释。爱人可以是她的港湾、她的盟友，而不是她需要为之牺牲事业的理由。多元的情感关系，如友情、亲情、师徒情等，都可以共同构成她探索世界的底气。

## 7.4 失败的尊严：探索本身就是意义

健康的女性叙事，要赋予失败以尊严。并非所有野心都能实现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失败。

在这种叙事中，探索本身就是意义。女主角可能在途中发现最初的渴望并非真正所爱，可能被更美好的事物吸引而转向，可能并未登上权力的顶峰。这同样是一个完整且有价值的故事。因为它的主题是自我认知的深化，而非成败的界定。

## 7.5 成功的多元定义：自主的价值尺度

健康的女性叙事，要允许女性自己定义成功。成功可以是商业帝国的建立，可以是一个绝妙创意的实现，也可以是一种内心的平静与自洽。

当女性拥有定义成功的权利时，“野心”这个词就卸下了所有沉重的包袱。她不必按照社会设定的轨道攀登，不必追求他人定义的成就。她可

以走自己的路，追求自己认可的价值。

## 8 结论：从命运的奴隶到生命的作者

本文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：女性叙事中那些五花八门的“合法化”策略，其共同本质是将女性角色置于被动的位置，使其成为命运的奴隶；而真正的女性生命力，应当源于发自内心的主动追求自我实现。

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穿透了所有现象层面的分析，直指问题的哲学内核。被动，就是客体化——无论这种被动被包装得多华丽；主动，就是主体性——无论这种主动看起来多平凡。

波伏娃曾指出，女性的解放在于超越“他者”状态，成为能够自我选择、自我定义的主体。这一洞见在当代女性叙事中依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。真正的“大女主”，不是看她最终站在多高的位置，而是看她踏上这条路的

第一步，是源于内心的火焰，还是源于身后的刀。

从“复仇”到“我想要”，从“被逼”到“我选择”，从“为爱”到“我爱”……这一系列转变的实质，是女性从“命运的奴隶”向“生命的作者”的跃升。这种跃升不仅是叙事的进步，更是社会观念的深层变革。

当我们期待“我想试试自己可不可以”式的纯粹野心时，我们期待的正是这种主体性觉醒的最纯粹表达。那不再是奴隶的反抗，而是一个自由人对世界发出的第一声问候。

女性叙事的下一次飞跃，将不是让更多女性登上权力高位，而是让无数个她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、出于自己的理由、为了自己的渴望，迈出走向高位的第一步。

从“等待者”到“探索者”的原型转换，是女性叙事乃至人类文化精神演进的

深层命题。而叙事的终极力量所在是：它不仅是集体潜意识的“现形”，更是集体潜意识唯一可以被“改写”的场所。当更多的创作者有意识地为女性角色赋予“第一推动力”，当观众有意识地去拥抱那些主动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形象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集体潜意识的疗愈与进化：将那些沉积千年的偏见一点点带出潜意识的暗区，让它们在意识的光照下被重新审视、被重新书写。

正如荣格所言：“没有被意识到的潜意识，就成了命运。”套用这句话到我们的讨论中：那些未被意识到的集体潜意识偏见，就成了女性角色（以及现实中的女性）的叙事命运。而当越来越多的叙事开始有意识地呈现女性的主体性时，它就在改写这种命运：让女性从“命运的奴隶”真正走向“生命的作者”。

#### 参考文献

[1] 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. 第二性[M]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

[2] 申丹. 论21世纪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新发展[J]. 国外文学, 2025(02): 1-13.

[3] 乔安娜·拉斯.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[M]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20.

[4] Lanser, Susan. Fictions of Authority: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[M]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92.

[5] 庄庸. “我爱你，但与你无关”：这是女性网络文学对时代的回应[N].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, 2018-03-12.

[6] 戴倩倩. 汉唐女性复仇叙事研究[D].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, 2024.

[7] The Illusion of Empowerment: Gender and Authorship from Foe to Yellowface. NUS Blog, 2025.

[8] 琼·道格拉斯·彼得斯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解读[J].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, 2024(03).